



《论语》中的诚信观

□ 胡亚军

《论语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，记录了孔子的诚信思想。“诚”和“信”二字在《论语》中共出现40次，《论语》中的“诚”和“信”二字含义有所区别。“诚”作为“诚信”含义在其后的《孟子》等儒家经典中逐渐确立，而“信”大意为诚实不欺、恪守信用。《论语》中诚信思想主要通过“信”这个载体，表达了深刻的思想意涵，呈现了独特的实践智慧，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。

诚信是君子之品

孔子认为，君子人格是修身的最高境界，而诚信是成就君子人格的内在要求，可以作为衡量君子的标准。首先，诚信是君子安身之本。子曰：“君子义以为质，礼以行之，孙以出之，信以成之。君子哉！”孔子主张君子要以诚实的态度做事。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大车无輹，小车无輹，其何以行之哉？”诚信犹如车之輹輹，失之无法行走。人如果不讲信用，没有信誉，那他什么都做不了。子张向孔子询问安身立命之法，孔子说，“言忠信，行笃敬，虽蛮貊之邦行矣”，诚信是走遍天下的通行证。孔子认为诚信是道德品质的核心，是君子安身立命之本。其次，诚信是君子行事之基。“君子……主忠信。无友不如己者”，这句话说明，君子修德，最重要的是讲求忠诚、守信用。结交有诚信道德品质之人，不与失信不如自己的人交友。“言从而行之，则言不可饰也；行从而言之，则行不可饰也。故君子寡言而行，以成其信”，说过以后就行动，说话不能放空话，做事不能走过场。君子讲究少说话而多做事，以此来成就他的诚信之德。主要表现为：重承诺，“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”，一旦许诺，不能反悔；重言行，“敏于事而慎于言”，做事勤快敏捷，说话却小心谨慎；重实务，“先行其言而后从之”，先实行了，然后说出来。君子以行“讫言敏行”为荣，“讫于言而敏于行”，把话语谨慎行动敏捷视为光荣；君子以“言过其行”为耻，“耻其言而过



其行”，把说得多做得多视为可耻。孔子主张君子要成为先行后言、讫言敏行、谨言慎行、知行合一的有德之人。最后，诚信是君子行仁之方。“仁”是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理念，由“仁”延伸出其他诸种思想。“信”则是诸种思想得以践行的遵循和途径。因此，在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强调把诚信品德作为培养教育学生的主要内容，“子以四教：文、行、忠、信”。

诚信是为政之要

孔子提出“为政以德”，而要做到“为政以德”，必须讲诚信，并取得老百姓的信任。首先，诚信是安邦治国的重要条件。子贡向孔子请教治理国家的方法，孔子给出三条建议，“足食，足兵，民信之矣。”即粮食充足，军备充足，民众信任朝廷。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要去掉一些，三项中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军备。”子贡说：“如果迫不得已，要在剩下的两项中去掉一项，先去掉哪一项呢？”孔子说：“去掉粮食。”并强调为政立国的核心政德就是民信。孔子认为，“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”，一个国家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就会垮掉。一个国家要想立足，在任何时刻都不能失信于民，必须取信于民。其次，诚信是治理国政的重要

原则。一要做到“信则人任焉”。子张向孔子问仁，孔子说：能够处处实行五种品德。就是仁人了。这五种品德，就是“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”，孔子又说，“恭则不侮，宽则得众，信则人任焉，敏则有功，惠则足以使人。”只有诚实守信，才能被委以重任。子夏曰：“君子信而后劳其民”，执政者必须取得信任之后才去役使百姓。二要做到“敬事而信”。“道千乘之国，敬事而信，节用而爱人，使民以时”，为政者要以诚信、敬业的态度治理国家，体恤爱护百姓。三要做到修身取信。“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；上好义，则民莫敢不服；上好信，则民莫敢不用情”。执政者有信用，做出的承诺得到兑现，那么百姓自然动真情讲实话。最后，诚信为政的理想在于行仁政。孔子希望天下归仁，其诚信为政的理想必将指向“仁政”。执政者充实德行以诚信为政，目标就是要构建安定、清明、和谐之邦。

诚信是交往之道

《论语》中把诚信思想作为社会交往的价值准则和道德基础。孔子主张通过诚信往来来实现社会安定有序。首先，在家庭交往中做到“主忠孝”，这是家庭之信。人与人之间的交往，最基础的是家庭内部血缘亲情的关系。在孔子看来，孝

是仁的本源和基础。正如“君子务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为仁之本与！”“孝慈，则忠”，只有在家孝悌，在外才可能忠，“其为人也孝弟，而好犯上者，鲜矣”，一个人做到忠孝，自然容易做到忠信。根据《论语》中的论述，在家为孝就要做到感情上的“爱亲”、物质上的“养亲”、精神上的“敬亲”、情理上的“谏亲”、礼节上的“祭亲”五个方面。“宗族称孝焉，乡党称弟焉。”孝是敬父母，悌是敬兄长。把孝悌做好了，家庭也就和谐了。其次在朋友交往中做到“谋尽心”，这是交友之信。《论语》中，孔子及弟子都以诚信为交友的原则，忠实地践行诚信之德。一是自己讲诚信，用诚信之心获取对方的诚信。“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”，曾子忠于人，勤勉于己，通过尽心尽力地为朋友做事，获取诚信之友。“与朋友交，言而有信”，子夏同朋友交往恪守信用，通过言行一致的诚信行为结交诚信之友。二是对方讲诚信，君子之交“信以成之”。“益者三友，损者三友。友直，友谅，友多闻，益矣；友便辟，友善柔，友便佞，损矣”，在交往过程中要结交益友，同正直、诚实、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；同时要远离损友，即不同谄媚逢迎、表里不一、花言巧语的虚伪之人交朋友。三是诚信交往过程中，要恰到好处。“朋友数，斯疏矣”，朋友之间过分亲密无间就会把关系变得疏远。最后，在社会交往中要“谨而信”，这是社会之信。人与人之间不讲信用，就无法实现和谐。孔子说，“弟子入则孝，出则弟，谨而信，泛爱众，而亲仁”，晚辈在家孝顺父母，出外则会尊敬长辈，做事谨慎而说话诚信。这样的人会将家庭中的孝道用于所有的人，从而使整个社会形成亲如一家的氛围。由此就能呈现“老者安之，朋友信之，少者怀之”的理想社会。



在盐阜大地上，有两条著名的捍海大堤，一条是北宋名相范仲淹主持修建的范公堤，另一条则是1941年由新四军和本地抗日民主政权修建的宋公堤。两条大堤都因护佑民生、造福百姓而备受赞誉，而后者给当地民众留下了更为鲜活生动的记忆，党领导的新四军在抗战中为民修堤的功绩至今还被广为传颂。

盐城地处黄海之滨，千百年来，经常发生水患。尤其近代以来，沿海人民饱受海啸之苦。1939年8月30日，盐城沿海发生特大海啸，《阜宁县志》记载了这次海啸侵袭时的情景：“苏北沿海数百里，纵深尽成泽国……光是阜宁一县，死亡人口就达一万余众。”海啸过后，当地一些有名望的士绅前往当时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，请求拨款修复海堤，而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对修复海堤毫不关心，最后迫于舆论压力，划拨款项20万元用于修复堤坝。而在修建过程中，腐败官员偷工减料、中饱私囊，最终用于修筑海堤的费用仅剩11万元，原拟挖土20余万方，实际只挖土5万方，修了一道堤身矮小且低于高潮位的海堤，当地老百姓将这条海堤讥称为“韩小堤”。第二年海啸再次来袭，“韩小堤”一冲即溃，阜东大地再次成为一片汪洋，沿海地区的人民陷入危险之中。

1940年10月初，八路军第五纵队政委黄克诚率部队东进南下，挺进华中，到苏北平原开辟盐阜区抗日根据地，10月10日，由共产党领导的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告成立，时任八路军第五纵队供给部部长的宋乃德担任首任县长。当地民众请求共产党、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修筑海堤。对于修筑海堤一事，宋乃德深入群众体察疾苦，召开座谈会广泛争取各界意见，然而当时不少人对成立不久的共产党政府能否修成海堤还心存疑虑、怀疑观望。

民生无小事，枝叶总关情。宋乃德把修堤事宜向刘少奇和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做了汇报。刘少奇坚定地说：“新政权刚刚建立，要办的事情千头万绪，但是应该先抓大事。什么是大事？凡是人民群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，再小的事情也是大事。”陈毅在修筑海堤的问题上也指出，“阜宁县的海堤修不修，直接关系到我们在苏北能不能站住脚，人民政府能不能巩固，共产党是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，我们的军队是不是真正的抗日救国的人民子弟兵等等根本性问题。”在得到刘少奇和陈毅的支持下，宋乃德修堤的决心更加坚定，他带领技术人员到沿海实地勘察，丈量残缺的旧海堤，测算土方量；登门拜访当地的进步乡绅代表，和他们一个个谈话动员，宣传共产党和新四军的为民政策，就修堤细节进行探讨会商；并代表县政府向民众作出“修堤全部费用不用人民负担，以盐税作抵，发行100万元公债，由政府偿还”的承诺。经过不懈努力，修筑海堤的方案在1941年2月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中得到广泛支持获得通过。

1941年5月15日，海堤的修筑拉开帷幕。新四军官兵和抗日民主政府的干部与广大民众同甘共苦、共同奋战。黄克诚、张爱萍等新四军将领多次到施工现场和民众一起扛锹挖土，鼓舞士气。6月梅雨季节到了，又逢时疫流行，许多筑堤民工病倒了，正患疟疾的宋乃德不顾高烧坚持驻守大堤参加劳动。这些情景令当地的农民、盐民、渔民耳目一新，看到了共产党真心是在为老百姓办事，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广大民众纷纷加入施工队伍中来，修堤大军从千余人猛增至两万。在修堤过程中，抗日民主政府全力保障修堤民众的粮食供给，大堤开工不久，一度粮食告急，仅能维持数天之用，新四军在军粮十分困难的情况下，仍分批调拨了12万斤军粮支援大堤修建。抗日民主政府全力保障民工劳动所得，工资按所做的土方数给价，每土方2角7分，相当于国民党政府修堤时工资的7倍。发放工资时，把土方数和

工资额在工棚前的公告牌上进行公示。在海堤修筑过程中，新四军、抗日民主政府和群众不仅要克服缺钱缺粮缺水等重重困难，还要坚持与日伪顽等敌人作斗争。在海堤修筑之初，就遭到敌人的阻挠和破坏，他们四处散布谣言说“新四军是借征民夫筑堤为由抽丁当兵”“修筑海堤是共产党导演的一场骗局”等，还派出大批特务，欺骗、恫吓群众。对于此种情况，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派出民运工作队员，深入基层和群众，揭穿敌人散布的谣言，发动和组织群众积极投身修堤工程。筑堤期间，日伪飞机不时临空骚扰，但广大干部和群众仍然坚持施工。敌人还派特务袭击施工工地，杀害了数名工地干部和技术人员。八滩区区长陈振东在遭到匪徒威逼时说：“我为筑堤而来，今为筑堤而死，死而何憾！”最终被残忍杀害。宋乃德同样遇到威胁，他坚持斗争、毫不退缩。为保证筑堤的顺利进行，新四军第三师部队一边反“扫荡”，一边抽出兵力保护筑堤民众的安全，最终挫败了敌人毁堤的阴谋。

1941年7月31日，海堤修筑工程终于全部竣工。这道大堤南自扁担港，北至头臂，全长90华里。新堤刚建成，恰逢海啸来袭，比1939年海啸更为凶猛，冲击时间延长20分钟，但新堤岿然不动、安然无恙。海堤修建成功，整个工程发行公债60万元，实际只用了51万多，这项公债支出，于翌年由抗日政府全数还清。百姓万众欢腾，无不交口称赞共产党、新四军和以宋乃德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的功绩，公议将此堤命名为“宋公堤”，以与宋朝名臣范仲淹在苏北沿海一带修筑的“范公堤”相媲美，并立起“宋公碑”永久纪念。

一条“宋公堤”，见证了共产党和新四军把人民放在心中，为民服务办实事的初心使命，是人民至上原则的体现；一座“宋公碑”，反映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、对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的拥护爱戴，记载的是历史、更是民心。在江苏这片革命热土上，我们党正是因为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，才有了苏中七战七捷、淮海战役等重大胜利，也正是由于始终与人民心连心、同呼吸、共命运，党团结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建立了新中国。如今，“宋公堤”已成为江苏盐城著名的红色地标，更是我们党一心为民的历史见证和生动缩影。

新四军与宋公堤

□ 贾正东



宋公堤今貌

为官不营私的晏殊

□ 刘燕荣 徐伟鹏



晏殊（991—1055年），字同叔，北宋著名政治家、文学家。景德元年，以神童荐，次年三月，廷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晏殊由此开启了五十载仕宦生涯。难能可贵的是晏殊一直坚持为官不可营私，守官必须廉白，一生清正廉洁，做到了俸养清俭、家风清正。

俸养清俭若寒士。曾巩修史，称誉晏公“虽少富贵，奉养若寒

士。”《宋史·晏殊传》亦载：“殊性刚简，奉养清俭”。晏殊身为朝廷重臣，所得俸禄颇丰，可他的日常生活却如一介寒士。晏殊平日饮食清淡且很少，他从小到老都喜欢吃家乡风味的油煎麦饼，佐以一头葱几瓣蒜，就可饱一顿，极其节俭。晏殊曾对宋真宗坦陈自己“喜宾宴饮”，但他的宴饮欢会相对简朴。宋代叶梦得《避暑录话》中记载了晏殊家举办的“空杯宴”场景：晏殊宴请宾客不会事先做隆重的准备，直到看见客人来了，才命人简单布置一个空杯，斟了酒以后，上点简单的果蔬小菜，与客人谈笑风生。宴罢晏殊铺纸研墨，作赋吟诗。晏殊是宰相，也是文人雅士，他举行的宴会更像一场古代诗词大会，以文会友，以文识才。晏殊不但饮食节俭，宴请宾客简单，在处理公务时也十分注意节约。他看完收到的书信、公文后，绝不轻易抛弃和烧毁，而是将封皮、空白无字的天头、地角、边条裁下来，小心翼翼地放好。有空时，将这些有皱纹或折痕的废纸全部熨得平整整齐，用来写诗、填词打草稿。甚至皇帝有事向他咨询对策时，他也用这些小纸条回信。

为官不营私。同朝为官的哥哥晏殊为他置办生日礼物，他断然拒绝接受，原封退回并回信严厉陈说：“弟弟虽然当了丞相，但这是朝廷的重托，唯恐胜任不了。不管如何，我总是牢牢记住，为官不可营私，守官必须廉白。弟自奉甚俭，饮食简约，家中两三天才吃一次猪肉，如果买了鱼或别的什么荤腥，猪肉就不买，而且买其他肉食的錢也不准超过买猪肉的錢。古往今来，那些有道德修养有廉耻的圣贤哲人，当了官后，总是小心谨慎，多为老百姓办好事，少为自己谋私



利。……想我们弟兄并没有为百姓建下什么大功业，没有为黎民带来什么好处，却日日坐享百姓膏血，纵使不招祸也应感到愧疚啊……”收到晏殊的信后，晏融夫妇很惭愧，从此也节俭起来。“为官不可营私，守官必须廉白”正是晏殊一生清廉为官的坚守。天圣六年，晏殊调回开封，被任命为御史中丞，执掌御史台，他勤勉为政，恪尽职责，连续递交《场务不得妄增课利》《差刺员兵士代百姓充驿子》等奏疏，向朝廷上报妄增课利、百姓承担劳役过重等问题。天圣七年二月，晏殊改任兵部侍郎兼秘书监、资政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，八月上奏《乞罢职田奏》，最终获得宋仁宗批准，解决了“屡致讼言”的官吏职田问题。晏殊为官尽心竭力，正如其在《雪中》诗所言：“衣上六花非所好，亩间盈尺是吾心”，一直心系百姓的温暖安康。

未尝为子弟求恩泽。晏殊共生育了9个儿子6个女儿，其中一个儿子过继给了早逝的弟弟晏颍，也有众多亲属，他为官50年却“未尝为子弟

求恩泽”，在人事方面不开后门、也不走后门，更不搞歪门邪道、行贿受贿，清正廉洁、似兰斯馨的家风家教由此可见。晏几道继承晏殊的品格，坚决“不能一傍贵人之门”，甚至有“求见”者也被拒之门外。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对晏殊的家风家教赞誉有加：“予观晏元献之八子，咸循循雅饰，一言一行，无不和于规矩准绳；于是，知公之有家教也。后得所著《义方记》，阅之，益信公之善训其子，而其子之善继善承，真所谓毋吾尔祖也。”晏殊所著的关于家教家风的《义方记》虽已经散佚，但清正的家风却一直绵延传承，晏殊之子崇让、侄孙升卿，曾孙绍林、敦复、敦临、肃均等为宋代进士。晏殊孙晏溥，靖康初在金人南侵时，散尽家财，募兵抗敌，后与妻赵氏双双战死。曾孙晏孝广曾任扬州尉，建炎三年，金兵直逼扬州，孝广率兵抵抗，最后英勇战死，其女自刎而死。待制李易为孝广作传，赞曰：“父死于忠，女死于烈，忠孝一门，光我简牒。”可以说正是因为晏殊家族家风清正，才会有满门忠烈一脉传承。